



不“挂”导师发不出？文科研究生遇论文“署名”难题

近年来，文科硕博研究生论文发表的署名问题，引发广泛争议。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我的第一篇论文，目前已经改到第八稿，我自己都不想看了。但老师每一版都认真帮我修改且标注，说实话应该他拿一作……”

“我导师修改完后跟我说：本应你是一作，但这样会影响发表，将你列为二作，你看是否可以？”

“法学生，感觉没老师带，硕士很难发出来。”以上言谈，都来自硕博研究生对论文署名问题的讨论。近年来，文科硕博研究生论文发表的署名问题，引发广泛争议。

概括来说，期刊、学生、导师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很多期刊对硕博研究生独立署名的论文不予采纳，要求将导师署名为第一作者才能发表；但对硕博研究生而言，各类成果评价往往只承认第一作者，学生的劳动成果得不到合理承认，严重打击其积极性；而许多导师没有直接参与学生某一论文的研究，对期刊的这一要求也深感无奈。

署名名副其实、问心无愧

博士生陆宇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直言：“我个人也挺不能理解这种现象，研究是我自己做的，为什么要靠署名的方式来证明它有价值？如果是我遇到这种情况，会认真请教老师这篇论文有什么缺陷，并作出相应的修改；换言之，如果要借导师的‘招牌’，总得有名副其实之处吧。”

“我们教研室在这方面的学术风气还蛮好的，师门发表的论文，都没有挂过老师的名字。我的导师是一名作风‘老派’的学者，他不喜欢这种相当于‘瓜分’学生劳动成果的风气。何况我的专业是一种‘十年磨一剑’的学问，说实话对于老教授们而言，学生的文章还是太稚嫩了。”陆宇说。

在一家期刊担任副主编的贾明回忆：“我2006年博士毕业，读硕士时，共发表了五六篇论文，都是独立署名。当时还不流行所谓‘C刊’，考评机制没有那么严格和机械。”

贾明也在所高校任教，遇到过自己带的博士生请自己“挂名”的情况。“为了博士生毕业，如



视觉中国供图

果学生需要我挂名，那我就必须深度参与论文的写作和修改，让署名名副其实、问心无愧。”

近年来教育发展，博士点增多，博士生扩招，博士后扎堆儿。他们很多都必须发表了论文，才能毕业或出站，这必然导致僧多粥少，所谓的发表门槛越来越高。贾明认为，如果高校能有更多自主权，比如，取消博士生论文发表等要求，只认真和严肃地审核博士毕业论文的水平，以博士论文质量作为毕业的主要依据，那么，这个紧张的局面也许会有较大缓解。

期刊也有“青年友好型”，但大部分仍对作者有“限定”

贾明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其在刊物会发第一作者为青年学者的论文，也发博士独立署名的论文，但不发硕士生的论文——无论署名第几。2024年发博士生的论文，约占刊物全年发表论文的20%。

贾明坦言，绝大多数人文学期刊，特别是C

刊，确实希望作者是名家，至少教授、副教授，对博士生和讲师的文章兴趣不大。“因为他们要考虑论文发表之后，有没有他引，特别是C刊他引。而名家、高级职称教师的论文他引率相对较高。”

2024年12月28日，南京大学联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知名学术期刊，根据期刊意愿和实际情况，推出了首批191家“青年学者友好期刊”，某核心期刊也在其列。主编石一文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该刊目前只发表独立署名文章，尤其重视青年学者的文章，“青年学者在我刊发表文章，均为第一作者”。

石一文给出了一组数据：2024年的作者队伍中，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占比接近60%，全年发表博士论文7篇；以“现当代文学栏目”为例，2024年发表论文22篇，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论文为13篇（其中博士研究生论文1篇），占总论文篇幅的60%；“造型艺术”栏目，2024年发表文章22篇，45岁以下青年学者的论文为17篇（其中博士研究生论文1篇），占总论文篇幅的77.3%。

石一文也坦承，有的期刊的对作者的“身

份”和“级别”有要求，不发或很少发博士生的论文，硕士的更不用说了；要想发表，第一作者需要挂上导师的名字。

石一文解释，之所以有如此限定，期刊确有“苦衷”。“在当前的期刊评价体系中，能不能成为核心期刊，是决定期刊生存和发展的关键。相比青年学者，资深学者在论文转载、获奖以及影响力等方面更具优势，可以增加期刊的学界影响力和社会声誉度。”

改进署名方式，突破研究生论文发表的困局

“问题的关键不是导师应不应该署一作，而是文科论文长期形成的署名方式，有必须改进的地方。”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宁说，硕博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完成论文写作，是一种学术合作行为，参与合作的师生双方，其对论文的贡献，都应该在署名中得到合理认可。要探索一种让师生“双赢”的署名方式，如此才能真正为研究生论文发表的困难破局。

在刘宁看来，理科论文在这方面有很成功的经验，比如理科论文将导师署名为通讯作者，进行论文发表的硕博研究生，依据实际贡献，署名为第一作者、第二作者等，在进行论文成果统计时，通讯作者享有与第一作者同等的成果评价。这样的署名方式，就是师生“双赢”，期刊也摆脱了为追求名家效应而牺牲青年作者利益的无奈，很值得文科期刊借鉴。

刘宁进而提出，文科论文的署名机制，是以独立研究为核心形成的。随着新时代文科有组织科研、跨学科研究迅速发展，的确需要探索更适合作式研究的署名方式。

“期刊、学生、导师之间，之所以形成‘怪圈’，正是一种学术生态固化的表现。”石一文说，对三者无论哪方而言，首先，要秉持学术公器之初心，各司其职，各尽本分；其次，各方要加强交流合作，创新知识生产模式，优化学术评价体系，构建更为规范有序的学术共同体。

对青年学者，石一文建议，在研究生阶段应以学习为主，要大量阅读本专业的经典论著，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为未来的科研之路打下坚实基础；在多读的同时也要多写，写作是对思维能力、文献解读能力等综合能力的训练；不要将发表学术论文当目的，把基础打牢，选题有价值，写作有新意，发表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当然，这需要为青年学者提供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健全的制度保障。

（受访学者要求，贾明、陆宇、石一文为化名）

抑郁就像任何肢体或器官的损伤一样，需要就医、康复，不需要“你没有事，只要坚强”，而这本书则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能够指导你救急的小药箱。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春天的脚步近了，与一般人印象中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的场景有反差的是，这是一个抑郁高发的季节。春季气温波动大、光照时间变化，易引发血清素和多巴胺分泌紊乱，加剧情绪波动；复工返校的环境变化也带来各种新的压力。

在网络上，许多“抑郁症怎样才能自愈”的经验总结，看上去符合科学，也很详细、很全面，如，“不要忍耐，立刻去医院就诊”“停止攻击自己、思考过去、恐惧未来”“锻炼专注当下细小的事情”“过有规律的生活”，可以说从行动上、心态上都给出了贴心的意见。但真正因为一句劝说、一篇帖子被治愈的人又会有多少呢？一个网友在这种帖子下面留言：道理都懂，可是真的做不到。

若溪是应用心理学博士、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还有儿女双全的家庭，但她也曾在4年间3次被抑郁症困扰并竭力对抗。就是这样一个一位具有双重标签的作者，写作了《自我的重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抗抑郁手记》这样一本突破传统的作品。

“我知道真正抑郁的人，注意力、语言理解能力都是有障碍的。文字学理性太强，或篇幅过于厚重，他们可能看进去。”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若溪回忆起自己的亲身经历，“抑郁的人往往有强迫思维，很多情绪不听使唤，一些症状如惊恐发作时，他们也是没有自控能力的，但他们又不能一天24小时都和专业人士保持联系。所以我想，一本能让他们自助、能让他们身边人帮助他们的工具书是非常必要的。”

有写作此书的念头之前，若溪在患抑郁症期间，曾经受到国外一本面向抑郁症患者的康复操作手册的帮助和鼓励。在后来的日子里，复盘自己的经历时，她也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从0打造出一本更适合国内社会环境、能让国内抑郁人群更好看懂、更好操作的“康复工具书”。

这本书没有晦涩的术语堆砌，也不拘泥于心理学流派的争论，而是以作者自身3次抑郁症发作并康复的真实经历为蓝本，将康复过程拆解为可操作的具体步骤。

书中的指导以短句、问卷和表格的形式呈现，小学生也可以理解。若溪尽力使这些指导涵盖患者日常生活、思想困境的每一个细节，包括了如何判断自己是否需要看医生，看医生前应当有什么准备，如何选到最适合自己的医生和咨询师，如何记录用药的情况，如何从寝食、情绪、运动等多方面记录恢复的状态……像“家庭医药箱”般，为患者提供日常急救的指引，也为健康人、医生、心理咨询师搭建理解的桥梁。

对于想要自己帮助自己的群体，若溪在书中首先帮助大家掌握抑郁情绪和抑郁状态的识别以及应急策略。书中列举了抑郁与普通情绪低落的区别：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低落、思维迟滞、动力减退是核心指标，需及时就医。这一点对于大多数人和症状较轻的人群来说都是非常有用的知识。而对于较为严重的患者，应对突然袭来的窒息感或自杀念头，她建议通过“安全环境清单”（如联系特定亲友、转移至开阔空间）实现即时干预。

如果已经确诊，就可以使用若溪给出的“用药与就医的理性指南”了。若溪针对患者对药物的抗拒心理，以亲身经历解析抗抑郁药的利弊，强调“遵医嘱”的重要性，并详细记录用药反应监测表，帮助患者与医生高效沟通。她还提出“停药需至少两年周期”的警示，避免急于求成导致的复发。

面对抑郁、焦虑人群缺乏生活的动力和想法的执行力等特点，若溪结合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亲身经历，提出了“5%改变法则”：从整理衣柜、步行10分钟等最小行动开始，逐步恢复对生活的掌控感。这种“微调”策略降低了执行门槛，避免患者因目标过高而自我否定。

本书还因大量篇幅解释、指导亲友和医生如何有效帮助抑郁症患者。亲人、朋友和抑郁人群的沟通话术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若溪一再强调，应当从“你什么抑郁”向“我能为你做什么”转变，做到有效陪伴——她指出“你要坚强”“制定计划表”等常见鼓励方式可能适得其反，并建议亲友采用“非评判性倾听”——如简单回应“这一定很难受吧”，或通过陪伴散步、整理房间等实际行动提供支持。

“现在许多地方，精神科的门诊量和就诊人数相比，会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为了保证效率，医生往往来不及、顾不上去说这些。”若溪说，“所以我也希望一些医生可以从书里获得启发，给病人哪怕是只有几句话的认知引导与情感支持。这会让人离开医院时感到，自己不是只拿了药就走，而是获得了一种系统的疗愈。”

这种设计让书籍脱离“一次性阅读”的范畴，成为可反复使用的工具。正如若溪所言：“对抗抑郁症的过程，正是重建自我的过程。”本书提供的不仅是方法，更是一种“带着症状生活”的智慧——承认极限，接纳波动，在破碎中寻找重建的可能。

“改变现状的勇气和能力，在我们真正迈出第一步，走进新的生活之前，是摸不着、看不见的。”若溪最后表示，如果患者能够凭借自己的意愿和身边人的支持，踏实地接受诊断、治疗，远离压力源，加上适度的锻炼，保证足够长的休息时间，身体的自愈力就会强化、起效。

“最后支撑我们的，是我们身体里与生俱来强大的自我修复的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追求更美好生活的自愈力。”若溪说。



《自我的重建：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抗抑郁手记》 出版社供图

淋过雨的心理咨询师，撑开了一把伞

文化中国行

接收、转化当下年轻人对经典文学IP的时代性、个性化理解，以此来为年轻人提供情绪价值、勾起共鸣。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今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95周年，大四学生郭潇涵在朋友圈晒出了左联的旗手人物——鲁迅的磁吸扣金属徽章的照片。她上小学的堂弟评论：“上网老是看到他的表情包，我们上个学期终于学到了他的课文了！原来还有人把他做成徽章呀！”

原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契诃夫……郭潇涵打开购物网页，将印刻着这些作家语录和头像的文创产品图展示给堂弟看，堂弟逐一指认自己课上学过或课外读过他们的哪些作品，略带疑惑地问姐姐：“你们也不考这些了，买它们做什么呢？”

在旅游景点文创和博物馆文创吸引大众目光的时候，出版文创也在不断增长，开始吸引年轻的粉丝。今年1月，第37届北京图书订货会首次增设了文创展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健全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也有政协委员提出，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文化IP”+“文化”+“激发消费新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年轻人为什么爱上出版社文创？什么样的出版社文创可以与消费者达成更深度的链接？出版社文创未来的发展空间又是怎样的？这个万物复苏的春天，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进行了一次深度走访。

源自经典读物的文创很新潮

郭潇涵学的是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对古籍编撰很有兴趣，偶尔她也会思考如今出版社的生存状况——读纸质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出版社在干什么呢？怀着这样的想法，她注意到了在“卷”文创的出版社。

她最先注意到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创品牌“人文之宝”。第一眼看到“刘关张”中筒袜和曹操的“吾好梦中杀人”字样眼罩时，她被逗乐了，“很无厘头，与《三国演义》的宏大感形成了反差”。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文创工作的内芮也自豪地承认，“人文之宝”的优势就是创意，他们更擅长“玩梗”，挖掘趣味性。

在北京读研的许舒文，今年年初在网上看到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文创里的马克思”新品首发式，转发给了好几个同学，也关注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经营文创的网店账号。

许舒文学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喜欢关注文创。在她的印象里，从前涉及此类主题的文创，品类较少，风格也大多低调保守。“其实都不太能称之为文创，只是在笔记本、帆布袋这些物品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朝花夕拾文创咖啡店的鲁迅咖啡。受访者供图



人民文学出版社文创品牌“人文之宝”的“刘关张”中筒棉袜。受访者供图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帆布袋、托特包。受访者供图



人民教育出版社李雷与韩梅梅琼瑶冰箱贴套装。受访者供图

印一个图案或几句话。”许舒文说。

而这次中央编译出版社推出的文创，给许舒文的第一印象就是“很大方”。名词和口号都明明白白地亮了出来，非常显眼，同时又不失设计水平，字体和整体色调简洁、和谐，运用了版面、邮票齿孔边框等风格和元素，让许舒文感到“没有矫饰，有一种很纯粹的理想的温度与力量”。

“年轻人是强烈认同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符合现代年轻人审美的文创的出现，让他们有了新的方式来彰显自己的身份。马克思主义曾经在全球多地、多个年代都是流行文化，它的文创从来不当和‘土’‘老旧’等形容词联系在一起，而应当是青年的、与时俱进的。”许舒文说。

中央编译出版社负责文创的副社长张远航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设计人员通过给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语录、肖像、文献手稿等与实用载体融合，将抽象理论转化为视觉符号，实现从文字到多形态的文化表达；书签、笔记本、帆布袋、徽章、有声书灯等多种产品类型，既可以打造学习场景，也可以作为礼品、收藏品。“我们想以轻松活泼的形式消解理论的距离感，吸引非传统读者群体关注马克思主义内容。”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童年课本文创也吸引了许多目光，80后90后被这种新奇的形式勾起了童年回忆。看到李雷与韩梅梅，还有鹦鹉 Polly，就像动画片里的人物一样出现，网友评价：“当它们再以文创的形式和我们见面时，我们不会再想起学不会、背不出的情景，心中涌起的只有对旧时光的怀念。”

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创部负责人徐政解释说，在开发“课本中的鲁迅”系列之“闰土又蠢”时，将“蠢”制作成当下流行的、能提供情感慰藉的毛绒玩具，还利用文创IP设计了互动环节——通过现场竞猜或背诵《少年闰土》课文段落赢取亚克力挂件或“蠢”错本，这成为今年北京图书订货会期间最火爆的现场活动之一。

文创很“养眼”，内涵更“动人”

“这就像新时代的座右铭。”27岁的程序员高浩说，他的工位上摆着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亚克力冰箱贴，上面写着“人类啊！你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其实高浩并不太了解这套冰箱贴的主题《先知三部曲》，只是看到这句话，瞬间被击中。“以前人们做摘抄或者选人格格言，也并不一定要把某本很厚的巨著全部看完吧，”高浩说，“我感到一种

召唤，文创本身的设计也有艺术感，这就够了。”

相比高浩的“一见钟情”，郭潇涵则有“久别重逢”的体验。她上初中以前，智能手机还没有十分普及，她的兴趣爱好就是看书、漫画、杂志、“大部头”，她都“照单全收”，“都是以小孩子的认知和理解能力去看的，有一些书读得囫圇吞枣，随手拿到就看一遍。”长大后，再看到一些作家与作品的文创，她会恍然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与小时候不同的思考、更强烈的情感。

“小时候，很多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现在不一样了，生活分出很多岔路口，我们可以真正把握自己的生活吗？我们面对难以撼动的人生阻碍时应当怎么办？如何与时代和世界和谐共处？”郭潇涵说，“很多人生长必经的哲学问题，穿插在世界文学名著和现代大家的作品中。小时候，我们很难对其有什么感触。如今再次看到这些作品的文创，我们除了会被它们的设计美感吸引，也会感到，其承载的思想也是触动人心的。”

许舒文也认为，中央编译出版社的马克思主义系列文创除了“养眼”，其内涵更为“动人”。“使用这些文创产品被人看到，这其实在无形之中，也会对使用者产生一种激励效果，促其自省——我在日常生活中有没有做到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的谦逊正直、踏实坚毅？有没有把唯物辩证法运用在我的日常思考中？我的工作学习是否遵循了实践论的指引？”

在许舒文看来，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了解比较初步的人，能看到身边人用这些文创，如果还能产生一些好奇心求知欲，那就更好了。“我期待有人问我文创上某一句话的历史背景和含义，文化就是这样一点一滴、潜移默化来浸润人的。”

张远航非常提倡生活化、年轻化的创新表达，使抽象理论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来突破传统文本传播的时空限制。他还希望有更多青年参与到社交媒体打卡等互动中，消弭其对理论的距离感。“这类文创既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轻骑兵’，也是出版业态融合转型的创新实践，为严肃思想注入时代活力。”

出版社文创的“下一站”怎么走

在经营过程中，内芮发觉，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长盛不衰，或赢得百分百的好评；不过，当出版社文创主要取材于国家级IP和义务教育阶段的阅读书目，更容易引起广泛的回应。一方面，“共同情